

總之，順應基督教在華發展的趨勢，建國前，莆田教會亦在「自治」、「自養」、「自傳」方面做出積極的探討與實踐，試圖實現教會的自立，雖未能取得圓滿的成績，但也實現了部分的「自治」、「自養」和「自傳」。更重要的是，經過這種探討和實踐，「三自」的思想從此根深柢固地保留在當地基督徒的腦中，這為莆田教會完全的自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並為建國後莆田教會的「三自」愛國運動的發展建構了基本模式。當然，不可否認，「自治」、「自養」和「自傳」是在華基督教在外來的壓力下所作出的回應，而不是華人基督徒自覺的行為；是因應整個信仰群體遭遇的攻擊而得出的反省，從而使中國教會能夠長遠地在經濟、人力及物力上得到自給自足，而不再依賴西方差會的資助。在這方面，莆田教會也不例外。試想，如果沒有因「洋教」的屬性而導致的種種壓力，莆田教會，乃至整個中國教會，可能也不會在此方面作出應變。

## 【四】

### 近代福州基督教建築

#### 形態演變與歷史發展

◎張金紅

福州地處中國東南沿海，為近代中國最早開放的通商口岸之一。1847年1月2日，<sup>1</sup>一艘鴉片船載著傳教士楊順(Stephen Johnson)抵達福州，揭開了新教在福州傳播的歷史。自此之後，帶著「中華歸主」的夢想，傳教士們紛至沓來，在這個東方古國的海濱城市傳播著上帝的福音。傳入福州的新教差會主要有美部會、美以美會、聖公會。三差會在福州的傳教活動中，出於傳教策略及切實所需的考慮，建造了一批教堂、學校、醫院等的建築實體。

以往學者對福州基督教的研究多著眼於傳教史、教會教育、出版等方面，對教會建築鮮有論及。本文擬對近代榕城基督教建築的演變歷程進行梳理，並進行簡要探討。

概括說來，近代基督教建築在福州的發展，大致經過了從

<sup>1</sup> Ellsworth C. Carlson: *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 Cambridge, Mass., 1974, p.5.

最初的租用民房，到起蓋簡易建築，再到建造堅固的西式建築，最後是設計中西合璧風格的建築群這樣一個循序漸進的歷程。

衣、食、住、行是人類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對於一個初來異地的傳教士來說：「首要解決的緊迫問題就是爲他和他的家人尋覓一處安身所在。」<sup>2</sup> 這就涉及到建築的問題。傳教士初來之時，中國政府沒有賦予傳教士在華購買或永租土地的權利，當然，他們也不可能將住房像行囊一樣隨身帶來，所以最初只能租用中國人的房子。1847年美以美會派出第一批傳教士懷德夫婦（Mr. And Mrs. Moses C. White）和柯林（Judson Dwight Collins）到達福州。最初寄居於中洲美部會教士寓所，後租屋另住。聖公會於1850年由筭成（Robert David Jackson）和溫敦（Willian Welton）兩教士傳入福州。溫、筭二人攜有香港主教致英國領事的信件，在烏石山神光寺租到住所。在福建傳教21年的美以美會傳教士麥利和（R. S. Maclay）在他的著述《生活在中國人中間》（*Life among the Chiese*）中記述了來榕傳教士租賃的第一間寓所：

2 R. S. Maclay: *Life among the Chinese: with Characteristic Sketches and Incidents of Missionary Operations and Prospects in China*, New York: Carlton & Porter, 1861, p.158.

「傳教士在福州的第一個寓所是一座中國人的舊房子。一層高，圍以高牆，位於中洲。每年五、六月間閩江漲水時，水會高出地面兩英尺。作爲外國人的住所，有必要再加一層。將樓上作爲家人臥室，樓下作爲儲藏室、廚房和僕人的房間。」<sup>3</sup>

在談到位於城外洋頭口一帶，從中國人戴成章手中租來的鼓店而改成的佈道所時，麥利和說道：「我們只能將就著使用這個佈道所。福州的佈道所通常是一間低矮、狹窄、陰暗的中國式房子。這類住所極少清刷、油漆，也缺乏通風採光設備。我們設法在這類房子中和許多人接觸。」<sup>4</sup>

從這些點滴記述中，我們可以感覺到麥氏對福州民居頗有微辭。實際上也確實如此。麥氏對福州民居曾有如下介紹：

福州的房子通常只有一層。木製結構，輔以板條和灰泥，屋頂覆蓋瓦片，下層民眾的住房以及商店、鋪子等白天直接開向街道，到晚上關閉起來。室內光線來自前面和後面的窗戶，但更多時候這些窗戶被窗板遮住，以阻擋風雨。這些房子既沒有煙囪也沒有天花板，只有泥土的地面。由於這樣的構造，這些建築低矮、昏暗、悶熱、骯髒、不利於健康。在某些方面，較高階層的住宅會好一些，如前所述。但結構上仍很粗劣，昏暗，不舒適。它們被建於高牆之間，前後的天井被連綿的圍牆圍合，形成封閉的空間。天井鋪以平滑的石板，大多數情況

3 Ibid., p.169.

4 轉引自朱峰：《在信仰與實踐之間——福建基督教史鉤沉》，香港：匯美傳意，2002年版，頁27。

下，會有一口小井，在天井中央或角落，上覆以石板保護。人們會在天井中種植花卉草木，放置頗具藝術性的石頭和柱子。通常，從街上走進來，會發現天井兩側靠牆都建有低矮的房間，向內出簷，連接庭院的前牆與主體建築。走過天井，就進入這幢建築的主廳堂。主廳堂與其他房間寬度相近，但進深更淺。在主廳堂的兩側各有房間，同樣進深但寬度較窄。與主廳堂一樣，這些房間的後面也有相對應的房間。後院與前院相似，但通常會小一些，趣味也稍差一些。大型住宅一般包括一系列的房間，中間插入天井，四周圍以高牆，前面臨街，自成一體。<sup>5</sup>

談到福州的公共建築，麥利和說：「這些建築的建築材料不牢固，工匠的手藝粗劣，品味低俗。同時作為大型建築，無一不缺乏必要的採光、通風設施及舒適性。」<sup>6</sup>

對於福州人的居住條件，盧公明（Justus Doolittle）、麥嘉湖（J. Macgowan）等傳教士也有過批評。麥嘉湖在遊歷過福州之後寫道：

（福州）人口、房屋如此密集以致於沒有喘口氣的多餘空間來淨化從骯髒的街道及擁擠的房屋中飄來的惡氣。和其他東方民族一樣，中國人也不愛乾淨。他們生活在污穢不潔之中。他們的住房不整潔，自己也不洗澡。在英國能引發瘟疫的臭

5 R. S. Maclay : *Life among the Chinese: with Characteristic Sketches and Incidents of Missionary Operations and Prospects in China*, New York: Carlton & Porter, 1861, p.158 °

6 Ibid., p.144.

氣，在這兒竟沒有引起任何不適，連傷風感冒都沒有。門前的污水氣味難聞，也沒有人提出絲毫的抗議。<sup>7</sup>

在福州生活過多年的盧公明也有類似的描述，他說「中國人的住房通常只有一層，木質結構，幾乎看不到磚構的堅實住房」，他對福州人住宅的地板、天花板、屋頂也都有記述，特別提到了窗戶的作用，「中國人的窗戶大多為木質，即使是富裕的家庭也很少用玻璃，……當需要光線時，會把窗戶完全打開或只掀開一部分。夏天，窗戶還有通風的作用。」<sup>8</sup>從他的描述中可以明顯感覺到盧氏認為中國人的房子不舒適，功能不足。基於這樣的感受，傳教士感歎：「我們不能憑被描述過的那樣去設想在這個口岸（指福州）的外國人生活很悲慘；事實上，其悲慘程度遠遠超過這些。」<sup>9</sup>事實也確實如此。福州民居缺乏衛生、通風、採光等健康條件，確實讓傳教士們深感不適。對早期傳教士來說，艱苦的工作及不適的氣候和生活條件，經常使他們疾病纏身，甚至死亡。僅以美部會為例，1850年美部會外籍傳教人員在福州有15人，到1856年僅剩5人。<sup>10</sup>其他人非死即病，相繼離開。可見，建造適合於傳教士自身居住、佈道的場所是早期傳教士不失時機的重要工作內容之一。

7 Rev. J. Macgowan : *Pictures of Southern China* (華南寫實), London, 1897, p.86.

8 Justus 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New York, 1867, Vol.1, p.41.

9 Rev. J. Macgowan : *Pictures of southern China* (華南寫實), London, 1897, p.90.

10 翁懷友：〈福州公理會傳道史〉，《中華基督教史》，頁191。

## 二

衆所周知，近代早期洋人不准在城內居住，福州也是如此。楊順到福州的第一件事就是與英領事若遜（R. B. Jackson）取得聯繫，希望能在城內建屋居住，未果。由於地方紳民的抵制和和約限制，美部會初期的活動主要局限在中洲。最初該會在中洲建了兩層洋樓，作為寓所，同時，在下渡小嶺租賃店鋪一間，供講道禮拜之用，是為福州第一座禮拜堂。美以美會傳教士來榕後，也試圖到城內和南台建立傳教場所，認為至少應有一座教堂、一棟佈道使住宅。但同樣由於官紳及民衆的反對，未能成行，只好在閩江南岸的倉山發展，在此建蓋房屋，以作寓所、佈道、學校之用。就連英國駐福州第一任領事李太郭（G. G. Lay）最初也是被安置在城外。馬士在《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中寫道：

福州是一個滿洲駐防的城市，滿洲弓箭手對於加在他們身上的恥辱當然是憤慨的；而福州人在當地的騷動也僅只是次於廣東人。由於這個原因，這個領事（按：指福州第一任英國領事李太郭）一向被安置在城外一片泥地上用木杆架成的一座簡陋房子裏……用盡力量想要在城裏找到一所適宜的住處，這原是他有權要求的，甚或在這個傳染病區以外的其他任何地方找一住所一概都成徒勞。」後來通過英國全權公使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的幫助，「領事館才在城裏得到了一所高大而通氣，寬暢而堂皇的房屋；住在這裏領事館內的人，實際上是些囚犯，他們如果不冒著推擠和侮辱的危險就不能離開屋子。<sup>11</sup>

雖然聖公會的傳教士起初強行在城內烏石山居住過，但後來引發「神光寺事件」及「烏石山教案」，也一度搬出城外。

因此，傳教士只能在城外通過各種辦法或租或買部分土地，建造一些簡易住宅供自己和家人使用，有時也在家中開辦日學。麥利和曾在城外南台天安山暫租到一塊土地，並建起了一座帶有遊廊的簡易住宅，只有一層，「為輕巧的框架結構建築，牆由板條和灰泥構成。」<sup>12</sup>之所以建造這樣的房屋，是因為差會考慮到「當時尚不清楚福州官方允許我們在這待多久；還有就是初來乍到，我們不知道在福州的氣候條件下適合建造什麼樣的房子」，<sup>13</sup>還有一點原因就是當時的傳教士對福州的建築材料還沒有十分清楚的瞭解。諸種原因之下，當時的傳教士只好建造一些造型簡單的寓所及學校。由於這類建築不夠堅固，不具耐久性，現已沒有實物保存。就資料所及，筆者所見相關敘述主要有：「1856年12月26日，基順（Otis Gibson）設寄宿學校，位址在買下來的旗昌洋行（RUSSELL & CO.）房子很寬敞，木結構。是由不熟悉西方建築風格的中國工匠建造的西式房屋之一。」<sup>14</sup>1859年，新校舍建成，基順記述到：「新校舍耗資500美元，包括廚房、飯廳、教室和16個睡房。每個睡房住2個男生。睡房之中有一個房間用作儲藏間，一間

11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三聯書店，1957年，頁407-408。

12 R. S. Maclay: *Life among the Chinese: with Characteristic Sketches and Incidents of Missionary Operations and Prospects in China*, New York: Carlton & Porter, 1861, p.170.

13 Ibid., p.170.

14 Ibid., p.231.

為老師宿舍，還有一間給我的老師用，其餘的歸 26 個男生使用。」<sup>15</sup> 以及「1850 年秋天，在麥利和的住宅後院建了一所小的框架結構房屋。內外用灰泥粉飾。1851 年 1 月 1 日，在麥利和夫人的主持下，女日學在此開辦，建築用費 55 美元。教師們在家裏休息，在學校用餐。」<sup>16</sup>

可知，初期的教會建築一般型制較小，建築費用低，建材主要是木材和灰泥，未大量用磚或石材，建築手法與福州本地民居相同，但風格有別；注重採光、通風、衛生。

### 三

隨著傳教事業的進展，建立街頭佈道所和教堂，成為傳教的基點。曾有教士很形象地描述說：「街頭教堂是傳教士的堡壘，在那裏，猛烈的炮火射入敵人的陣營。」<sup>17</sup> 1855 年，駐福州英國領事得到政府公文，許可外國人永久租借、保有不動產。<sup>18</sup> 於是，各差會紛紛著手在福州城內外租購地產，意欲建造堅固的房屋。「而於教會已立下初步的根基之後，即繼以辦理教育與醫藥兩大事業，以推進佈道事業的發達。」<sup>19</sup> 所以，

<sup>15</sup> Ibid., p.239.

<sup>16</sup> Ibid., p.242.

<sup>17</sup> 轉引自董黎：《教會大學建築研究》，珠海出版社，1998 年版，第 57 頁。

<sup>18</sup> 朱峰：《在信仰與實踐之間——福建基督教史鉤沉》，匯美傳意，2002 年版，頁 26。

<sup>19</sup> 《聖公會報》，1949 年 8 月 15 日，第 38 卷，第 5 期。

教堂、學校和醫院建築就構成了近代基督教建築的主體。

早期來華傳教士都不是專業建築師，但卻不得不解決幾乎有關建築行業的所有問題。所以麥利和說到：「住宅、教堂、學校的選址、籌畫安排、簽定合同、選擇合適的建築材料以及監督建造，傳教士會發現所有這一切都是對他本人可能擁有的商業才能和知識的極大鍛煉。」<sup>20</sup> 傳教士需要瞭解有關這些方面的所有事情，然後作出正確的決定並付之於行動。所以，美國史學家柯文認為：「評價新教早期成就的真正標準，不在於它收到了多少信徒，而在於它為後來的傳教工作所奠定的基礎。」<sup>21</sup>

此時，多年的生活經驗使得傳教士熟諳福州當地的社會習俗、人文環境以及地理氣候。他們懂得在福州的地理氣候條件下使用什麼樣的材料、建造什麼樣的建築。

「接下來在福州的生活經驗使我們確信應該建造實用牢固的磚構住宅、教堂等。這種建築較前述的簡易房屋花費大，但是它們更堅固，免去了每年維修的必要，同時提高了居住者的安全、舒適感。」<sup>22</sup>

談到福州的建材，麥利和如數家珍：

<sup>20</sup> R. S. Maclay : *Life among the Chinese: with Characteristic Sketches and Incidents of Missionary Operations and Prospects in China*, New York: Carlton & Porter, 1861, p.158.

<sup>21</sup> 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年版，頁 604。

<sup>22</sup> R. S. Maclay : *Life among the Chinese: with Characteristic Sketches and Incidents of Missionary Operations and Prospects in China*, New York: Carlton & Porter, 1861, p.170.

福州的建築材料主要是木材，磚瓦、石灰等等，木材主要是杉木和松木。這兩種木材輕且耐用，並易於加工……。（這兩種木材）福州地區很多，價格也合理。出產於內地，伐後沿閩江順流漂下，到達福州。木材是這個港口城市重要的貿易商品之一。大量的木材通過海路運往北方。磚也很多，質量也很好。一種淺灰色，一種紅色。紅色磚由一種紅土燒製而成，與在美國使用的紅磚很像。任何數量、尺寸、質量的這兩種磚都很容易獲得。但為了保障質量，有必要與商人或生產者簽定合同。普通百姓用的磚質量較次。這些磚由離福州10里的磚窯燒製而成。還有一種扁平紅磚，大小為14平方英寸，厚度1英寸，質量很好，通常用於鋪設浴室、裝飾爐灶表面及有平緩屋頂的小房子的表面。瓦與磚的生產場地一樣，也是由土燒製而成，呈淺灰色，約有9平方英寸，一般一邊寬一邊窄，約有1英寸厚。形狀為橢圓形，以便於順序排列。用瓦作材料可以有安全、耐用的屋頂。但是，對於要建大型教堂的外國人來講，解決瓦片所帶來的重量問題有很大的困難，通常很難建築用瓦覆蓋的自我支撐的屋頂。花崗岩也是一種用於建築的材料，產於福州下游15英里的山裏。質地優良、價格適中，運輸也不是很費力氣……。石灰來源於貝殼，經過在窯裏燒製，便成了很好的石灰，用於製作灰漿、水泥及粉刷塗料等等。但實際很難得到純粹的白石灰，因為中國人經常做假，摻入一種白土。<sup>23</sup>

<sup>23</sup> Ibid., pp.160-162.

此外，麥氏對如何建造圍牆和屋頂也有詳盡的記述。<sup>24</sup>

講到福州的氣候，麥利和是這樣描述的：

與中國其他地方的氣候相比，福州的氣候條件較好。夏天氣溫華氏98度，冬天為32度。然而由於空氣中濕氣很重，不論是熱天還是冷天，同樣的溫度下與美國氣候相比，都是令人難以忍受的。從5月到10月初，福州的天氣很暖和，但有時是令人難以忍受的炎熱。在這樣的天氣，外國人往往吃不下食物，並全身乏力、虛脫。不過，有時連降幾天的大雨有助於緩解酷暑。<sup>25</sup>

考慮到福州夏天的氣候對健康的影響，外國人建造的住宅一般「環以寬敞的遊廊，看起來高大、堂皇。在烈日炎炎的夏日，人們認為住宅中有這樣的結構絕對必要。」<sup>26</sup> 寬敞的遊廊也成了區別外國人建築和福州當地建築的顯著特徵之一。關於冬天的氣候條件對建築的影響，麥利和寫到：

福州的冬天很溫和，幾乎不下霜，所以屋基不必挖得太深，在地勢低的地方，要在地下楔入5至10英尺長的木樁，木樁之上覆以約3英尺長的扁平石塊。石塊水平放置，作為牆基。房基通常為石質，高出地面至少1英尺。或者由於地面不平，地基要高出該地面最高處至少1英尺；在地勢高的地方，

<sup>24</sup> Ibid., p.174.

<sup>25</sup> Ibid., p.149.

<sup>26</sup> J. Macgowan: *Pictures of South China*, London, 1897, p.91.

地面乾燥、堅硬，只鋪石塊就可以了。<sup>27</sup>

可見，此時傳教士對如何在福州建房已然瞭若指掌。接下來所建的房屋幾乎全部為西洋風格。主要有：美部會的格致中學、文山女中、西門堂、洪山堂、救主堂等；美以美會的英華書院、懿德道學院、馬高愛醫院、天安堂、真神堂、尚友堂等；聖公會的三一學院、陶淑女中、靈光盲校、塔亭護士學校、塔亭醫院、麻風病院、基督堂、真學堂、萃賢堂、石厝堂等。

#### 試舉幾例：

真神堂是美以美會在福州興建的第一個教堂，位於通往南街的茶亭，於1856年8月3日行獻堂禮。<sup>28</sup>它也是東亞第一堂。以其為源，美以美會傳至中國內地其他省份並傳入朝鮮、日本等國。所以，真神堂在美以美會歷史上有重要影響。如今我們已不能目睹該堂實物，只能從相關記述和照片中對其有所瞭解。在麥氏的著作中是這樣記述的：

建築很堅固，石質基石，高於地面5英尺。為了避免每年一次的江水氾濫，教堂就建於這個堅固的地基之上。整個建築長76英尺，寬38英尺，內高20英尺。有一前廊，長10英尺，寬34英尺。一個禮拜堂，長47英尺，寬34英尺，高20英尺。在禮拜堂後面有4個房間，其中兩個房間地面較低，分

27 R. S. Maclay: *Life among the Chinese: with Characteristic Sketches and Incidents of Missionary Operations and Prospects in China*, New York: Carlton & Porter, 1861, p.170.

28 Ibid., p.200.

別為長21英尺、寬12英尺以及長13英尺、寬12英尺。牆為磚砌，外牆2英尺厚，內牆18英寸。前後牆由普通磚塊砌成，內部粉刷為白色，外部粉刷為灰色。教堂正面用漂亮的紅磚建造，運用白板條，粉飾整潔。兩側牆上分別有6個高窗，每個均為10英尺長、4英尺寬。其中兩個開向走廊（一邊1個），8個開向禮拜堂（一邊4個），兩個開向後面地面較低的房間。地面較高房間的採光問題由地面較低房間兩窗上部的兩個小窗解決。另外在建築的後部還有兩個窗子。

整個教堂只有一個開口，位於教堂正立面。有一門道，8英尺寬，11英尺高。門開向外，由木材精美製作而成，漆成白色。門框兩側各有一細方形壁柱。在門道兩側各有兩根大的方形壁柱立於石基之上，高達20英尺。這四根壁柱為紅磚建造，構成教堂正立面的主體結構。凸出牆面2英尺，底部為3.5英尺。磚砌結構只到壁柱的頂部，在這之上為與門道上方相同的木制結構，但形制更大，同樣漆成白色。這個結構隱藏了屋頂的山牆，並比屋頂高出1英尺。屋頂的上面建起了一個漂亮的小圓屋頂，高約13英尺，可以放置教堂的鐘。

講堂裝飾有整潔的講壇、祭壇和座位。一次可容納約300人。座位和整個教堂的內部裝飾均為桃木色。除了放鐘的圓形小屋頂和部分正立面，整個教堂的外部木構也都是這種顏色。講堂內有兩個走道，每個均為3.5英尺寬。通向門廳有兩道門，每道4英尺4英寸寬，9英尺高。門廳用石頭鋪就。講堂鋪以2英寸厚的板條，後面的房間為1.5英寸。<sup>29</sup>

29 Ibid., pp.197-200.

廊，便進入內部。屋頂是油漆過的木架結構，由覆蓋著黏土的看起來像是花崗岩石的柱子支撐。柱頭上方為直達屋頂的橢圓拱形。屋頂與主樑之間的拱形空間為木構樑架。……佈道壇位於聖壇南側，唱詩班在北側，讀經台位於兩者之間，全都是油漆過的木製品。聖壇高出地板4個臺階。聖壇地面和各通道也被漆過，有琉璃瓦的效果。按照中國人的裝飾習慣，教條、主禱文及十戒黑底金字地被刻於匾額之上。聖壇的拱形背景上是一幅寫有中國字的卷軸，上書「榮耀歸於至上的主，和善歸於世人」（筆者按：根據英文翻譯，也許有誤）。各窗之間的牆面上也掛著多種卷軸，寫著聖經中的相關詞句。雕刻精美的石質洗禮盆，位於教堂的入口處，在兩門之間。一個小的管風琴放於唱詩班旁的角落裏。此外還有一個法衣室。一個出席獻堂禮的建築師非常欣賞這座建築。說在這座建築上，他沒有發現任何不恰當的地方。『每一部分都很好』——沒有建築師的幫助，一個非建築行業的人員能夠建造如此之好的教堂，對此他感到吃驚。……整個建築耗資5,000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生活在這個口岸的外商捐贈的。教堂被命名為「CHOI HIENG TONG」，字面翻譯為「所有好人的殿堂」（THE HALL OF ALL GOOD MAN），但是，我們更隨意地將它譯為「萃賢堂」。在中國，人們認為用人名來命名一幢建築是對這個人不敬的行為。<sup>33</sup>

<sup>33</sup> Eugene Stock: *Study of the Fuh-kien Mission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1882, p.40.

再來看一下天安堂。天安堂為美以美會在福州建造的第二座教堂，為福州美以美會年議會所在地，在此舉行過多次周年慶典。天安堂於1856年10月18日行獻堂禮。英文禮拜堂於1856年12月28日。<sup>30</sup> 建築是這樣的：

建築整潔堅固，磚石結構，外牆由紅磚砌成，飾以白線條。屋簷下繞建築一周為漆成白色的精美木結構。整個建築看起來令人愉悅。講堂內部長25英尺，寬34英尺，高20英尺。門廊進深8英尺，前有4根木柱，也漆成白色並刻有凹槽。窗戶10英尺高，4.5英尺寬。講道壇、祭壇及凳子由漆過的硬木製成。禮拜堂過道3英尺寬。<sup>31</sup>

萃賢堂為聖公會在福州建立的第一座教堂，位於南後街：

1862年，胡約翰在南後街黃巷口購民房一所，殆即本教區在閩最先告成之第一座禮拜堂也。當時，紳民仇教之聲愈烈。1863年教會遭迫，而斯堂亦付之毒焰中，被毀矣。時胡約翰壯志不衰，復向西商徵募5000美元，赴香港備材雇匠，至1865年9月建築落成。<sup>32</sup>

1865年10月8日行獻堂禮。金亞德（Arhtur William Cribb）對該堂的描述是這樣的：

這是一座磚構的哥特式建築。從街上進來走過一個小的門

<sup>30</sup> Ibid., p.209.

<sup>31</sup> Ibid., p.209.

<sup>32</sup> 〈福州南後街萃賢堂史略〉，《福聲》第一期，民國二十年四月一日，第一卷。



除了少數幾處建築現還存在以外，其他大部分建築的原貌我們已經看不到了，所以今天只能憑藉傳教士的記錄及相關照片進行探討。非常明顯，這些建築均為西洋風格，普遍使用連拱廊、半圓拱窗、高尖窗等。由於材料和技術條件的限制，屋頂大多使用中式瓦片，但地基、牆體使用磚石結構。建築看起來堅實、牢固、耐用，益於彰顯教會實力。通風、採光很好，型制較大，大多可以提供二、三百人使用的空間。

#### 四

近代中國可謂命運多舛，《辛丑合約》的簽定最終使清政府警醒。清廷為內外情勢所迫，決意「力圖治強」，頒佈了一道道改革法令，稱得上「朝令夕改」，令人應接不暇。與教育有關的方面有：1901年廢止八股取試；1903年頒佈《欽定學堂章程》，並鼓勵學生出國留學；1905年詔令停止科舉考試制度，建立仿西方公學的國家教育體系；1906年宣佈預備立憲，推行新政。這樣，清廷以頒佈法令的形式為新式學校的開辦掃清了障礙。而對教會而言，庚子教難使他們真正認識到了來自中國廣大民衆的反抗情緒，感受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在力量。迫於形勢，教會在反思之後，認為有必要重新看待中國文化，調整其傳教策略。中華教育會（成立於1890年，由基督教在華各教派聯合組建）於1902年第四屆年會通過「請求外國差會派遣訓練有素的教育家來華工作的呼籲書」，標誌著基督教對華傳教方式的根本改變，傳教士從「佈道者」而成為「教育家」。

1910年的愛丁堡傳教士會議在其「與國民生活基督教化有關的教育」的第三次委員會提出：「由於基督教的普世啓示（universal message）在教育工作中有一種獨特的作用，故應當在世界上各大戰略中心設立教會大學。」<sup>34</sup>決定在中國的四個戰略中心設立大學，分別為：華北的北京，華東的南京，華西的成都和華南的福州。20世紀的前30年，基督新教教會在中國共建有大學15所。<sup>35</sup>其中有兩所在福州，為：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和福建協和大學。

在當時的福州，這兩所大學建築最大、最壯麗。華南女子文理學校建於1914年。第一任校長程呂底亞（Lydia A. Trimble）。1905年5月，美以美會總議會會議在洛杉磯舉行，經程呂底亞建議，會議決定：「從福州地理上與文化上之觀察，均認為有設立高級女校提高女子教育之必要。」<sup>36</sup>遂開始籌備在福州設立女子大學。初為華南女大預科班，稱為華英女子學堂。因在嶺後路購買的校址遲遲未能開工，學校租借毓英女校校舍。1911年，彭氏樓（又稱馬蓮彭樓，現為師大校部辦公樓，勝利樓）正式開工建造。

「彭氏樓（Payne Hall）由美國愛荷華州的建築師畢齊先生（Wilfred Beach）設計。他照搬自己在晨邊學院（Morningside College）盧思義樓（Lewis Hall）的設計圖紙，加上中國宮殿式

34 轉引自徐光榮：《福建協和大學》，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頁6。

35 董黎：《教會大學建築研究》，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頁38-39。

36 《私立華南女子文理學院一覽》，福建省檔案館，39-1-23。

的屋頂設計。」<sup>37</sup> 彭氏樓「為三層樓之大屋宇，辦公室及圖書館皆在其中，並附設禮堂，可容五百人以上。」<sup>38</sup>

1914年行政樓彭氏樓和學生宿舍樓谷蓮樓（Cranston Hall）（現為民主樓）建成啓用。學校搬入新校舍。1916年學校改名為華南女子大學。

對這兩幢建築，時人回憶曾道：

馬蓮彭樓（彭氏樓）是一三層樓大院宇，式參中西，內是教室、辦公室、試驗室，可容學生300餘人。谷蓮堂宿舍樓可住學生150人，下層是膳堂廚房，外有健身房。程呂底亞宿舍也在谷蓮堂宿舍樓。」<sup>39</sup>

1914年當兩樓建成之時，「由於在福州第一次建造這種類型的建築，前來參觀的人絡繹不絕。當地的中國人稱彭氏樓為『基督的天堂』。」<sup>40</sup>可見其在當時的影響。1925年程呂底亞辭職，盧愛德（Ida Belle Lewis）繼任校長。「盧任院長僅二年之久，成宿舍一，名之為程呂底亞宿舍。係建築以紀念程校長者，其式與谷蓮堂宿舍同。」<sup>41</sup> 彭氏樓、谷蓮樓、程呂底亞樓

37 朱鋒：《基督教與近代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與華南女大比較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頁74。

38 《私立華南女子文理學院》（1930年編寫的學院概況），福建省檔案館，39-1-1。

39 張涵深：〈私立華南女子文理學院概況〉，《文史資料選編》之第五卷《基督教天主教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頁517。

40 L. Ethel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1956, New York, p. 22.

41 《私立華南女子文理學院》（1930年編寫的學院概況），福建省檔案館，39-1-1。

成為華南女子大學的主要建築物。

這3幢建築風格統一、和諧，採用中式歇山頂，飾有西式煙囪，四角起翹。屋頂突出部分用玻璃處理，便於採光、通風。磚石結構。牆身為紅磚砌築，以交錯疊置的花崗岩石代替以往的壁柱進行立面處理。中間的彭氏樓較大。二、三層的連拱高窗給人強烈的視覺衝擊。底層為長方形高窗。中間稍微突出，前置門廊，飾有六根圓柱，凸顯出建築物的高大、雄偉。兩側對稱。縱立面分為三層，花崗岩石疊至三層底部，上面兩層以白色線條隔開。兩邊的谷蓮樓和程呂底亞樓型制較小。也為三層。各有兩層的門廊，花崗岩結構，二層門廊前部飾以三根圓柱，以呼應彭氏樓的門廊立柱，並有西方風格的裝飾效果。窗子少且小。這一組紅白相間的建築群以及周圍優美的環境，體現了華南作為培養知識女性的場所應具有的秀麗、典雅的氣質。

還有就是福建協和大學。前文已述，福建協和大學的創辦意見源於愛丁堡會議。經過幾年的籌備過程，該校於1916年2月開學。初協和大學校址在倉前山觀音井街的老俄商洋行，借用英華書院科學實驗室。1917年學校購得永久校址：

「初始購買的土地包括閩江北岸50英畝的平原和山坡，大約在福城下游10英里、羅星塔（Pagoda Anchorage）上游15英里處。羅星塔在鼓山絕頂峰，距閩江口以西大約30英里。福建協和大學的運動場連同幾個實驗農場，一座倉庫和一幢學生餐廳坐落在由鼓山綿延的丘陵地帶形成的寬V字形中；在環山較低的斜坡上有學生宿舍、教職工宿舍和一個煤氣廠；在東面陡峭

的山脊頂部有人文科學館和自然科學館、校長樓和宿舍。」<sup>42</sup>

校址購得之後，莊才偉（Edwin C. Jones，協和大學第一任校長）聘請赫西（Harry Hussy）的芝家哥建築公司進行校園設計，「可能是由於赫西與洛克菲勒基金有關」。<sup>43</sup>但是，由於赫西沒有親自到協大進行過考察，在設計時也沒有對協大的山勢地形加以仔細考慮，所以他的設計被認為「從一開始就是無用的（useless from the start）」。<sup>44</sup>於是，莊才偉與墨菲一達納建築公司（Murphy & Dana）的 Richard Henry Dana 取得聯繫。1918 年，墨菲（Henry K. Murphy）親自來到福州察看協大校址。

墨菲（Henry K. Murphy）是 20 世紀初活躍在中國的美國建築師。生於 1877 年，1899 年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獲學士學位。1908 年開辦建築事務所。在美國時曾以設計殖民地式建築著稱，作品不多。墨菲 1914 年開始在中國活動。曾主持設計了數所教會大學，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金陵女子大學和燕京大學，標誌著墨菲在設計手法上的成熟。1928 年以後出任國民政府的建築顧問，完成「首都計畫」的制定工作，這也是墨菲在中國建築生涯的頂峰。福建協和大學建於金陵女大和燕京大學之前，雖不是墨菲設計成熟期的作品，但作為鋪墊，也在一定

42 徐光榮著，陳建明、姜源譯：《福建協和大學》，珠海出版社，1999 年版，頁 24-25。

43 轉引自 Jeffrey W. Cody：Building in China: Henry K. Murphy's "Adaptive Architecture, 1914-1935",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90.

44 Ibid., p.90.

程度上反映了他的設計理念，並為接下來處理金陵女大山地形設計提供了經驗。墨菲一生推崇中式建築風格，特別是北方官式建築，以建於明代的紫金城為最。他認為「中國的建築可與西方的建築並駕齊驅。中國建築師應從中國的傳統建築中尋找靈感，而不是刻意求助於西方建築作為原型。由此，他力勸中國雇主和同事們尋求中西建築的融合。」<sup>45</sup>無獨有偶，當時正值美國建築界折衷主義思潮盛行，基督教界也在展開並實施其「本色化」運動。正如傳教士建築師柏嘉敏（J. V. W. Bergamini）所言，「現在中國建築正處於轉型期，只有時間才能顯示其最終結果。但是我們可以在中國人之前建造適宜的建築以樹立良好的範例。」<sup>46</sup>

於是這個法無定式的時代為墨菲的設計活動展開了廣闊的舞臺。墨菲的這次福州之旅及其辦事認真、負責的作風給協和校董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有材料記載墨菲一達納建築公司對承接福州這所大學的建設工程很有信心。「我們的所作所為給他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除非莊先生有再找紐約其他公司的想法，否則，以我們的經驗和承接這種工作的能力，墨菲一達納建築公司肯定被選中；赫西已經被淘汰了。」<sup>47</sup>1918 年 10 月 2 日，董事會決定聘用墨菲一達納建築公司進行校園設計。1919 年 10 月 10 日，墨菲一達納建築公司根據實際情形繪製了設計

45 Ibid., p.2.

46 Chinese Record, Vol. 55, p.653.

47 轉引自 Jeffrey W. Cody：Building in China: Henry K. Murphy's "Adaptive Architecture, 1914-1935",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91.

圖並且連續幾年提出了令人滿意的工作目標。<sup>48</sup>但由於種種原因墨菲的設計並未全部成為現實。

校舍的實際修建是從1919到1923年。由莊才偉聘請的美國工程師米爾斯（C. B. Mills）指導，福州美以美會建築部<sup>49</sup>實地進行校園建設。米爾斯離開後，建築活動得到了物理學教授馬丁（F. C. Martin）的幫助。1922年春天，已修建了足夠的臨時校舍，於是福建協和大學從觀音井遷到了魁岐的新校園。新校園的建設活動仍在進行。在高智任校長時期（John Gowdy, 1923-1927年）兩幢漂亮的主樓——小加德納·霍爾紀念宿舍和愛德溫·C·瓊斯紀念科學館（後為理學院）——分別於1925年和1927年竣工。每座建築都有一個壯麗的「亨利·K·墨菲式屋頂」。1928年5月29日，加德納·霍爾宿舍被燒毀。1929年春重建，被改建成帶有幾間辦公室、教室和一個圖書館、一個小教堂的文科大樓（後為文學院）。由於資料所限，不知文科樓與原建築有多大差異，但從現存建築來看，改建過的文科樓與愛德溫·C·瓊斯紀念科學館（即後來的理學院）風格一致。

據曾在協大就讀的學生回憶，當時的協和大學是這樣的：

「文學院洋樓高3層。第一層右邊為文學系上課教室，文具部亦設在這裏；左邊為政治經濟系上課教室。第二層為辦公地點，左邊有會議室、校長室、會計室、文學院院長室、中國文

<sup>48</sup> 徐光榮著，陳建明、姜源譯：《福建協和大學》，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頁26。

<sup>49</sup> 見註64。

學系辦公室、印刷處和衛生間；右邊為教務主任辦公室、教務處和文學系、教育系、外文、歷史、哲學等系上課教室。第三層為圖書館和禮堂，占地較多。各層樓梯均設在正中，上下相連。第三層四周作飛簷，塗以彩色，刻上文句，頗為美觀。另有一層地窖，藏放雜物。」

「理學院洋樓高3層，分別為生物學系、化學系、數學系各一層，每層有各自的課室、標本室、儀器室、實驗室等。理學院聳踞於文學院上方，中間有路與石階可通，面積較文學院大些。大門設在院的正中，左右兩邊有水泥臺階通上下層。亦有地窖，藏放雜物。最高層四周作飛簷，塗以彩色，遠望更覺雄偉。」

「距理學院不遠，地勢凹下處為女生宿舍，似為2層或3層洋樓，景物清幽。校長住宅位於理學院、女生宿舍之間的最上方，從正面望去為筆直長方形。」

「文學院左邊有一小路，沿路而行，是男生三座宿舍，光國樓居中，光榮樓在其下方左側，光華樓在其下方右側。光國樓面積最廣，分前後兩截相連，前後截各為兩層洋樓，兩截之間有左右兩邊石階相通。兩截的中間地帶為廣坪，可供打羽毛球及曬衣服之用。兩截的洋樓上下，除全套衛生間外，共有宿舍30餘間，每間一般住2人。前截的樓上下正中為涼臺，上掛電鐘一個，可憑欄遠眺，把江光山色，盡收眼底。」

「光國樓門口正中鋪著石階數十級，一直通到學校大門口，中途經過事務辦公室，事務主任在此辦公。光國樓直下石階十餘層，有一條小路橫貫著，向左拐彎，走十幾步，到光榮樓男生宿舍，宿舍左側是山地，沒有路了；向右拐彎，走十幾

步，到光華樓男生宿舍。光榮樓與光華樓，建築的結構和形式，一模一樣，都是雙層洋樓，樓的上下層，都有全套衛生間，上下層有木梯相通。光國、光華、光榮三個樓，都有樓名標誌；所有房間的窗戶，都裝鐵線紗，以免蚊蠅飛入。光華、光榮樓的大門裝有彈簧，開啓後能自動關閉；樓門上半截也圍以鐵線紗，引進陽光。樓門口都接一個避雨亭，亭外有數級石階，以利行人避雨。」

「從光華樓往下走，可至廚房、膳廳，是男生三餐用膳處。膳廳為木構長方形樓房，長數十米，排著4行八仙桌，配以長板凳，中間為通道，可容三四百人。膳廳左旁為大廚房，學生不能進去。樓上為宿舍、倉庫、供炊事員住宿及保存貨物。膳廳右側，有一條很長的通路，沿路東行，可到後山。在叢林掩映中，漸露洋樓數座，高低上下，錯落有致，那就是美國人及中國教師的住宅了。沿膳廳側通路向西行，右邊是一片操場、打球場；左邊是一列平房，洗衣部、販賣部、醫藥室、體育室、理髮室等在焉。再前行，將經過庶務室，與光國樓門口沿石階直下的通路相連接。到此，有兩條路線：一，向右拐，則可達學校大門口和碼頭；一，再向前直行，將與文學院右側沿山而下的通路相連接。可見這些路徑，上下左右好像一個橢圓形相聯繫著，把文學院、光國樓、光榮樓、光華樓以及各個部、室圍繞起來。協大的校舍主要就是這些了。」<sup>50</sup>

<sup>50</sup> 郭毓麟：〈協大四年學生生活的回憶〉，《文史資料選編》之第五卷《基督教天主教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頁379-380。

從現存實物來看，理學院是整個協大最高的建築。三層，歇山頂形制，上置兩個小閣樓。整個建築紅色基調。以西方古典主義的縱向三段立面構圖，以底層為基座，石質，給人以沉穩、厚重感。嚴格對稱結構。以三層高的圓形凸壁柱將橫向劃分五段，中間靠門為單壁柱，之後為雙壁柱，正立面柱間淨空之比為1.5：1：1：1：1.5。整個立面紅白相間，簡潔洗練。屋頂出簷結構簡單，未施斗拱，與牆體的連接有些生澀。頂層較矮，飾有幾何形窗子，主要用以解決屋頂的通風、採光、散熱問題。正面採用大量玻璃窗，便於採光、通風。建築內部樓梯、地板為木製，並在二層樓梯開間兩側飾有中式額枋，天花板用木製方格裝飾，以製造中式內飾氛圍。

改建後的文學院亦為歇山頂形制，三層。大屋頂的屋簷下直接開窗。紅色基調。也是縱向三段立面構圖，以石質底層為基座。但三層高的壁柱將正立面劃分為十三段，構圖給人感覺不夠簡練。大量使用單壁柱，只用一組雙壁柱。同樣大量使用玻璃窗，以解決室內的光線及空氣流通問題。

這兩幢建築作為協大的主體建築顯得恢宏，有氣勢，給人印象深刻，很能體現墨菲的建築風格。此外，協大也不乏秀雅的建築。

光華樓和光榮樓兩建築形制相同。中式歇山頂。頂端隆起的部分安裝可開啓的玻璃窗，有別於傳統的全封閉處理，以解決多層室內小空間建築的通風散熱問題。另外，亦可有效利用屋頂空間。石質底層為地下室。兩層結構。紅磚牆面。屋頂與牆體的處理與文學院同。縱向立面兩段，橫向七段，也為半圓凸立壁柱分割。門的處理有別於前兩幢建築，改變以往抱廈式

結構，不再凸出，上飾中式出簷結構，懸以木製懸魚。鏤空的仿額枋曲線造型，使出簷過渡到西式牆體，並呼應中式屋頂。整個建築造型呈「凹」字型，恰好利用山勢地形，使後部伸出的兩部分與上山坡道之間形成類似福州傳統民居的小天井。小天井中間修有花壇，用以種植花草，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建築的審美要求。由於地勢的原因，這兩幢建築都有臺階直通二樓。光華樓前的臺階最外側的石質護欄上刻有8幅中國傳統民間題材的雕刻作品，內容有梅花、喜鵲、竹子、鹿、荷花、水鳥、鳳凰、牡丹、松鶴、桃花等。在左右兩側臺階的最低處，各有一憨態可掬的小石獅子。這些傳統的細部裝飾增強了建築的中式意味。同時也體現了墨菲對中國傳統古典建築審美的充分理解。

另外紅磚清水牆面的女生宿舍樓（原第四宿舍）形制簡單，氣質纖巧。捲棚頂，共五層，底層石質。正立面用紅磚砌就的細方形立壁柱分隔二層以上空間。二樓西側建有三個連續的小陽臺。整個建築較少中式特徵，只是門的處理與上述兩建築相同，為中式建築元素。

可見，墨菲在協大的部分設計，體現了他尋求中西融合的建築理念。也是由此，協大建築才成為當時教會大學中國古典建築復興風格的一部分，她較明顯地體現了中西文化的雙向交流，是本色化運動外在表現的一種成熟形態。協大建築的存在，已超出了其作為建築本身所具有的價值，體現了當時教會傳教策略的轉變，以及對中國文化的尊重與認同。

## 五

丹納認為，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性質面貌都取決於種族、環境、時代三大因素。<sup>51</sup>近代傳教士建築師 Walter. A. Taylor 也認為：

「對不同時期或風格的建築的研究發現，建築風格的發展受地理、地質、氣候、宗教、社會及政治、歷史等因素的影響。」<sup>52</sup>

近代中國社會多元並存，正如魯迅先生所言：

「中國社會上的狀態，簡直是將幾十個世紀縮在一時，自松油片以至電燈，自獨輪車以至飛機，自標槍以至機關炮，自不許妄談法理以至護法，自食肉寢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義，自迎屍拜蛇以至美育化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四面八方幾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事物，每種以各各自相矛盾。」<sup>53</sup>

以建築觀之，則表現為中西建築混雜。建築是「石頭的史書」，它記錄著歷史，同時也訴說著歷史。作為社會文化、思想的集粹表現，我們可以從建築中窺視彼時彼地的歷史場景。

如前所述，19世紀5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傳教士在

51 [法]丹納著，傅雷譯：《藝術哲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版，頁54。

52 *Chinese Recorder*: Vol. 55, p.657.

53 魯迅：〈熱風五十四〉，原載《新青年》第6卷3月號，1919年。

福州進行了斷斷續續地建造活動。從建造簡易建築，到堅固的西洋建築，再到中西合璧風格的建築群，經歷了一個從生澀到成熟的發展過程。現在我們反觀這段歷史文本，發現其實這一歷史事件發展過程本身及其建築實體即表達著我們想要瞭解的關於這一過程的幾乎全部內容，也就是為什麼有這樣一個過程的問題。

近代赴榕傳教士先是建造簡易建築。這是在條件限制下的一種無奈。為主的事業富有獻身精神的傳教士初來乍到，對異地的環境並不熟悉，再加上周圍並不「友善」。雖有條約保護，但福州當地政府並沒有對其在榕居於何地、居留多久有明確表示。所以，建造這樣的房屋，對傳教士來講是權宜之計。傳教士對福音事業在福州的進展呈觀望態度。同時，房屋的簡單構造反映了技術上的限制：傳教士並非專業建築設計師，對建材以及在福州建造什麼樣的建築沒有清晰的概念；形制較小說明當時的傳教事業舉步維艱，所辦學校學生人數寥寥無幾。所以此時的傳教士只能委曲求全，但總算有了安身之處。

接下來，隨著形勢的發展，中國政府允許教士在中國租賃土地。教務的拓展，信眾、學生及就醫人數的增多，差會勢力的增強，在福州有著多年生活經驗的傳教士開始有條件和能力的建造較大規模的建築。其表現為一個個能容納幾百人的書院、教堂、醫院的相繼建成。此時的建築幾乎全部為磚石結構、西洋風格，明顯區別於傳統的福州民居。Helen Wiley Dutton 在《教務雜誌》中寫到：「（傳教士）他們初來中國時，建造的住宅與其本國正在流行的建築樣式大體一致。」<sup>54</sup>之所以這樣，

<sup>54</sup> *Chinese Recorder*, Vol. 64, p.433.

部分因為教士的思鄉情結。麥嘉湖（J. Macgowan）在談到福州的一個教堂時，這樣說：

「教堂的設立，不僅象徵著在這塊異教的土地上他們仍忠誠於上帝，而且令其時刻回憶起曾經度過快樂童年時光的家鄉。他們從來沒想過通過模仿東方的建築式樣來建造他們自己的神聖殿堂，雖然這種建築式樣在東方人認為是其思想最高表達的寺廟裏充分展示著它的美麗。這個教堂的原型為主持該堂傳教士早年生活地區附近的教區教堂。那個教堂的照片，他從來沒有丟失過。」<sup>55</sup>

部分因為傳教士非專業建築行業人員，「十九世紀後期，傳教士在中國修建教堂，大多是自己憑印象繪製並監工完成的，甚至還有從國外帶來舊圖紙進行仿造的。」<sup>56</sup>此時的傳教士還沒有擺脫對中國建築的反感情緒。這種情緒由來已久。在1875年之前，西方沒有出版過全面介紹中國建築的著作。<sup>57</sup>中國建築藝術被長期排斥於世界建築藝術之外。中國禁教之後，對中國古典建築的成見更加強烈。1859年，法古孫（James Fergusson）在他的著作中還稱：「中國幾乎沒有可以稱得上建築的東西。」直至1914年，莫勒（Arthur Evans Moule）在為有志去中國傳教的學生自願者寫的手冊中還評論中國的建築通常

<sup>55</sup> J. Macgowan: *Pictures of southern China* (華南寫實), London, 1897, p.91.

<sup>56</sup> 楊嵩林著：〈中國近代建築復古之初探〉，載《華中建築》，1987年，第二期。

<sup>57</sup> Mary Gertrude Mason: *Western concept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1840-1876*, N. Y., 1939. p.234.



被認為毫無藝術性可言，式樣如中國柳景圖案般怪誕、奇異。他認為中國最優雅，最詩情畫意，最藝術化的建築式樣是廟宇，可在其中並不存在堅固性與莊嚴。<sup>58</sup>

此外，就是出於健康的需要，傳教士要求居住環境整潔、衛生、舒適，有利於身體健康。他們認為中式房屋由於通風、採光、散熱等功能很差，不能滿足這些要求。但不管怎樣，西式建築風格的大量出現，顯示出的是教會在對待中國問題上不調和的高姿態和文化上的優越感。也正是如此，才使得教會的西洋建築在每次的反教風浪中都成為衆矢之的。

庚子教難之後，教會重新審視在華傳教策略，清廷也加快了「師夷長技」，向西方學習的步伐。這一切都為教會大學的創辦做了充分準備。由是，在近代福州誕生了兩所教會大學：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和福建協和大學。這兩所大學為近代福州規模最大、氣勢最宏偉的建築。表現為中西合璧式，以協和大學為代表。建築風格的轉變暗示了教會在華傳教策略的改變。此時，教會將傳教重點從「佈道」轉向「教育」，這也就意味著傳教士本身角色的轉換——由「佈道家」而成「教育家」——這就要求傳教士自身知識素質的提高。20世紀初來華的傳教士大都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有的還是本國知名人士。有別於以往，這些教育家傳教士能夠客觀地看待中國文化，並尊重中國文化。在建築上為盡量多地使用中國古典建築元素，將中西風格相糅合，與周圍環境相和諧。可以說，教會大學的中西合璧式建築風格是教會「本色化」運動成熟的外在表現形態。

58 轉引自董黎：《教會大學建築研究》，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頁63。

中西合璧式建築風格的出現，除了教會方面的原因而外，也有建築從業人員的原因。20世紀前30年是西方建築師主宰中國建築行業的時代。這個法無定式的時代正值西方折衷主義思潮興起時期，在華西方建築師在對中國傳統建築重新進行價值評判的同時，努力尋求一種新的中西合璧式建築風格，代表人物有赫西、墨菲、柏嘉敏（J. V. W. Bergamini）、Walter. A. Taylor、C. A. Gunn等（前兩者為商業建築師，後者為教會建築師）。柏嘉敏認為：

「理想的教會建築要有吸引力，與周圍環境和諧一致，看起來西洋的意味要盡可能地少。」<sup>59</sup>

建築師J. Prip-møller（艾術華），也認為：

「建築是和諧的。所以，首先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問題：尋求建築的內在理念和這個理念的外在表現結構，即建築的靈魂和結構本身之間的和諧。同時和諧還意味著與周圍環境的關係……一邊是當地的傳統建築風格，一邊是引進的基督教思想、學校、醫院、教堂等。」<sup>60</sup>

當然也有一些建築師盡量少用中式風格，特別是中式大屋頂。他們認為建造中式建築不僅技術上有難題，而且費用也較西式建築高。但柏嘉敏認為「根據他在中國8個省份工作的經驗，中式建築的費用比西式建築僅多出3-7%。」<sup>61</sup>墨菲的估計

59 Chinese Recorder, Vol. 55, p.653.

60 Chinese Recorder, Vol.77, p.358.

61 Chinese Recorder. Vol. 55, p.654.



是8-10%。<sup>62</sup>由此一些建築師認為如果使用熟練的工人，中西合璧式建築費用不會太高。可見，在教會大學的建築風格上，教會和建築師一拍即合。

同時，教會大學建築反映了高標準的設計、施工，這需要由專業的建築公司承建。在20世紀的前20年，建材價格上漲，一些差會由於不斷增長的建築計畫，需要經過專業訓練的教會內部人員參與教會地產的長遠規畫，以避免建築公司的欺詐和濫用地皮行為。<sup>63</sup>美以美會1917年在福州成立建築部，<sup>64</sup>為教會的建築活動服務。但就是否聘用商業建築公司的問題，C. A. Gunn認為，在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選用好的商業建築公司也是值得的。<sup>65</sup>所以這一時期的教會大學包括協和大學在內，都是聘請專業設計師進行設計，由專業工程隊或工程公司施工建成。

綜觀以上文字可知，近代基督教建築在福州的引入及發展，經歷了從無奈、到張揚，再到調適的探索之路。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在此過程中基督教傳教策略的轉變、傳教士知識素質的提高以及建築領域的發展。這些建築是出現在近代福州「一堆密密匝匝無間斷的灰屋頂」<sup>66</sup>中些許鮮亮的筆觸。無疑，

62 Jeffrey W. Cody: *Building in China: Henry K. Murphy's "Adaptive Architecture, 1914-1935"*,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54.

63 *Chinese Recorder*, Vol. 55, p.645.

64 於1917年1月由原福州英華書院的E. F. Black負責籌建，意在設計和監造教會建築。見Jeffrey W. Cody: *Striking a harmonious chord: foreign missionaries and Chinese — style buildings, 1911-1949*.

65 *Chinese Recorder*, Vol. 55, p.647.

66 Eugene Stock: *Study of the Fuh-kien Mission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1882, p.11.

她們的存在與福州的民居風格形成鮮明對照，也對福州人的信仰、思維及生活方式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 參考文獻

- 1 Ellsworth C. Carlson: *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 Cambridge, Mass., 1974.
- 2 R. S. Maclay: *Life among the Chinese: with Characteristic Sketches and Incidents of Missionary Operations and Prospects in China*, New York: Carlton & Porter, 1861.
- 3 朱峰：《在信仰與實踐之間——福建基督教史鉤沉》，彙美傳意，2002年版。
- 4 Rev. J. Macgowan: *Pictures of southern China*（華南寫實），London, 1897.
- 5 Justus 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New York, 1867,.
- 6 季理裴：《中華基督教史》，上海，1907。
- 7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三聯書店，1957年。
- 8 董黎：《教會大學建築研究》，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 9 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
- 10 徐光榮：《福建協和大學》，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
- 11 Eugene Stock: *Study of the Fuh-kien Mission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1882.

- 12 《福聲》
- 13 朱鋒：《基督教與近代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與華南女大比較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 14 L. Ethel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New York, 1956.
- 15 Jeffrey W. Cody: *Building in China: Henry. K. Murphy's "Adaptive Architecture, 1914-1935"*,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6 *Chinese Record*, Vol. 55. 70.77. 64.
- 17 《文史資料選編》之第五卷《基督教天主教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 18 [法]丹納著，傅雷譯：《藝術哲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版。
- 19 Mary Gertrude Mason: *Western concept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1840-1876*, N.Y., 1939.
- 20 Jeffrey W. Cody: *Striking a harmonious chord: foreign missionaries and Chinese-style buildings, 1911-1949*.
- 21 J. Macgowan: *Pictures of southern China*, London, 1897。
- 22 魯迅：《熱風五十四》，原載《新青年》第6卷3月號，1919年。
- 23 《福聲》第一期
- 24 Eugene Stock: *Study of the Fuh-kien Mission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1882。
- 25 朱峰：《在信仰與實踐之間——福建基督教史鉤沉》，匯美傳意，2002年版。

## 【五】

### 本土化與信譽重建

#### 近代泉州基督教的本土化歷程

◎張鍾鑫

泉州，素有「世界宗教博物館」之稱。古代的泉州，曾以其博大的胸襟將道教、佛教、伊斯蘭教、基督宗教等攬入自己的懷中，而放射著璀璨光芒的宗教文化也曾是泉州文化繁榮顛峰上的一顆耀眼明珠。基督宗教很早即已傳入泉州，具體何時，學術界尚無定論。但可以肯定的是，元代基督宗教已在泉州傳播。<sup>1</sup>至明代，意大利耶穌會士艾儒略（Julios Aleni）曾九進九出泉州，期間受洗者甚眾。<sup>2</sup>明崇禎八年（西元1635年），天主教教士聶伯多（Caneveri）到泉州傳教。至崇禎末年，泉州已出現13座天主教堂。<sup>3</sup>清代，因「禮儀之爭」，雍正皇帝下諭禁止傳習天主教，於是在此後的一百多年間，基督

1 參見吳幼雄：《泉州宗教文化》，鷺江出版社，1993年6月，頁250。

2 參見林金水、吳懷民：〈艾儒略在泉州的交遊與傳教活動〉，《海交史研究》，1994年第1期。

3 吳幼雄：《泉州宗教文化》，鷺江出版社，1993年6月，頁260。